



# 烽火峥嵘十万屯

张维军

十万屯离思州古城很近,就在岑巩县思旸镇磨寨村,屯与古城相隔不过几里路程。十万屯建在磨寨背后的一座大山上,三面临崖,关隘重重,仅一条陡峭山路与外界相通,是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。如今当地极少有人知道它,就连磨寨人,都将它叫成了“石湾屯”。

岑巩叫屯的地方很多,比如凯阳屯、鲁溪屯、石坊屯、包家屯、大屯、小屯、军屯……起初不知何故,后来研究思州历史,才知道这些地名跟屯军有关,而且多是寨子的名字,是明清时期,朝廷统治者在思州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历史产物。

“十万屯”——好大的气势啊!当我偶然获知这个地名的时候,一下子来了兴趣,特别想去一探究竟。可是当我终于找到十万屯的时候,发现它竟然不是寨子,而是一座山顶上的军事古屯堡。

“十万屯,口朝天,十万人马驻半边,嘴箭扎里头,白纸糊外边。”提起十万屯,磨寨杨氏老人们还会脱口吟出这首歌谣来。

83岁的杨洪武老人幼时念过私塾,深谙杨氏家族史。他说,关于十万屯的这首歌谣,反映的是十万屯的地势特别险要,上面驻扎过兵丁,存放过武器,但实际上十万屯并没有那么大的实力,夸张地唱出来只是想吓唬前来攻屯的土匪,“白纸糊外边”指的就是糊弄外敌之意。

听到老人口中说唱的歌谣,我早已按捺不住,心仿佛飞向了眼前耸入云端里的十万屯。我急不可待地询问屯的情形。老人们说,上屯只有寨后一条小路可走,又窄又陡,多年没有上屯,不知还能否找到上屯的路。看到我急切的样子,71岁的杨启钧便去邀来几位熟悉情况的老人,一起换上爬山的行装,拿起刀具,朝着高高的十万屯攀登而去。

由于常年鲜有人行走,去十万屯的小路几乎难觅踪影。老人们弓着身子,凭着记忆在茂密林深的陡坡上小心翼翼地攀爬着,中途迷了好几回路。我有些担心和后悔,心弦绷得紧紧的,生怕老人们有所闪失。

摸索爬行到半山,终于看到一座石头垒砌起来的关卡,一道由石泥堆垒起来的长墙像巨龙一样从关卡处呼啸而起,钻进陡坡密林。老人们说,上山都得靠爬,要想突破重兵把守的关卡和防御墙,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一路上这样的关卡还有好几处,难怪古时再强大的土匪势力都没能攻破过十万屯。

登上十万屯,极目楚天舒,一览众山小。四周群山如聚,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来,十万屯仿佛坐拥十万雄兵。屯堡周围的防御墙有的还在,有的已经损毁,中间是一层

层的平台,台前都是人工用石头垒砌起来的堡坎。老人们说,以前这些平台上建的都是房子,住着杨家几百上千号人呢。如今房子早已不见了,变成了果林,高大的板栗树就像当年杨家号称的十万屯兵一样,密密麻麻地挤在屯头。

杨启均是杨氏家族史的传承人。他告诉我,杨氏祖籍在江西南昌,明末时一世祖杨光耀随军入黔,因功受封为千户头目,在思州府(岑巩县古名)近郊择地屯军。杨光耀会武术,有文化,在磨寨定居后,特别重视对子孙的教育,组织他们习文练武。数百年来,崇文尚武一直是磨寨杨氏家族的优良传统。

说到杨家的辉煌历史,杨启均从一口木箱底下取出一本祖传的杨氏族谱给我看。这部族谱叫《墨谱流芳》,是一位叫星杰的杨氏官绅于光绪十三年(1887年)编撰而成,历经130多年传承,族谱纸张已经泛黄,但秀美端庄、优雅沉稳的毛笔字依然色泽如新。翻开墨谱,一股浓浓的书香味直钻鼻孔,杨氏一门人黔240多年的历史如同波澜起伏的画卷呈现在眼前。这是一本难得的民间族谱,体例完备,视野弘阔,内容翔实,表述生动,字体优雅。这是我在岑巩看到的极具文史价值的民间族谱。

《墨谱流芳》在追溯杨氏一门源流时写道:“世传祖籍江西南昌府属,分游黔省,住居思州,或自辉始。行色匆匆,直抵思旸。”杨氏在磨寨是白手起家的,生活条件简陋艰苦,几代人居住的房屋都是茅草房。《墨谱流芳·火记》描述:“结茅为屋,编茅为壁。”茅草房易引发火灾,经常火烧连营,杨氏一族反复陷入

困境地。杨氏力图改变命运的主要法宝就是兴办教育,严训子弟习文武。族人视做官为最大的追求和梦想。后来杨家通过习文武,5房子孙不断出秀才、探花,出了不少文官武将。“名为八大房,维时家道未卜,丰享而科甲,渐见显荣。胜国、胜安、胜贵俱补博士弟子员,皆登仕路,耀门庭,光先人耳!”其后房有人,家家和顺。耕者力田,糊口读书,文章显世,光前裕后,人文之蔚起!”《墨谱流芳》这段记述,说明杨氏一门努力耕种是为了养家糊口和供子弟读书,由此来光耀门庭,振兴宗族。

磨寨出了读书人,考取功名在外做官的人越来越多,家声势力日渐显荣,于是安身立命的寨子也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《墨谱流芳·火记》写道:“我族之屋宇,造自乾隆嘉庆,补葺于道光,堂构之称,可无愧矣,隔河两岸,百余幢耳!”磨寨的茅草房变成了木瓦房,对河两岸,鳞次栉比,好不气派繁华。

教育的力量使杨氏看到了光明的前景,于是发达起来的杨氏初心更加坚定,他们修建宗祠,立下族规,创办私塾堂馆,开辟练武场,聘请严师教育训练子弟。

《墨谱流芳》收录同治十一年(1872年)杨氏官绅杨星杰的一篇记述,这篇记述说:“我祖明末入黔,宗祧至今,八九代人矣。丁数百余家,烟户百十余家,粮田积广四五亩,学馆推尊四五堂。嘉庆、道光赴文闱者有人,赴武闱者有人,经理学中干者三四代。应耐府衙门重件四五人。当军兴之秋,族中更赖有能人矣。”说明磨寨杨氏发展到清朝中后期,不仅人丁兴旺,而且拥有大量粮田资产,仅学馆就有四五处,族人习文武蔚然成风,青年人积极参加文武科举考试,取得功名者很多,在衙门和军队里都有做事的能人。

过了将近200年的太平日子。到了道光年间,鸦片战争爆发,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,半封建社会。内忧外患,社会震荡,民不安生。

咸同年间,水火、刀兵、瘟疫、暴政,夹杂交织,像飓风一样席卷黔东,加剧了社会矛盾,思州府及周边少数民族起义风起云涌,烽烟四起,社会大乱。

“离乱世界,坐船怕过兵差,坐家又怕抽丁。古人云,大兵过,篱笆破。”“老幼羸身,日虑无糊口度活,夜苦无栖身安寝。”“饿殍遍地,道死者相重。”“避难者,人山人海。”“田园荒凉,不见人耕。”《墨谱流芳》的记述,反映了清朝咸同年间,思州府当时的社会状况。

由于思州府的特殊地位,黔疆大小战乱,它都难免其祸。咸同年间,张

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,声势浩大,历时长久。张秀眉领导的苗军打下天马雷公田后,在此设立军总部,持续多年作战,将战火燃遍整个思州。

在四起的烽烟中,思州百姓为了保命,团结起来,穷尽一切力量上山建屯。一个村寨或一个宗族,组织力量将“寨子”从平地移动到险要的山顶上去,用石头修筑起坚固的防御设施。有条件的就购买枪炮作防御武器,条件不好的,就打造梭镖、刀枪或从山中捡来礮石作防御武器,并组织族中丁壮日夜防守。发现匪情,屯中立即燃放烟火,屯中丁壮老妇弱,全都手抄武器,誓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。太平日子,人们下屯劳作,发现匪情,立马上山躲避和防御。这种避敌办法,比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还有效。一时间,思州城乡的大小山顶上遍布起这种防御屯。直到今天,它们依然藏身山顶,遍视村寨,成为一道道山顶奇观。

“同治三年,阖筑十万屯之屯堡,烟火二百余户。”“我屯于贼军之夜,初更时遥见一碗水坡路,火光时亮,即呼上下寨勇,星夜上屯。四更,城中铜炮大震,火光四起。屯上之人,未遇其害。从此屯中大兴土木。”“初更后,各坡之顶上,处处皆见火光……每夜所闻坡顶之火,数十处耳。”

《墨谱流芳》清楚地交代,咸丰八年(1858年),苗军攻磨寨,一把火烧毁杨氏辛苦几代人建起来的家园。同治三年(1864年),杨氏举族之力,在寨后山顶建设十万屯,200多户人家搬迁上屯避乱。后来,思州府被苗军攻破,而近在咫尺的十万屯,却安然无恙,于是杨氏便在屯中放手经营。此时,一到夜间,思州府地处处山顶皆见火光,说明群众在山顶建屯避难已是普遍现象。这些记述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动乱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,人们日夜不得安生,平地不能活,只能躲上山顶石屯,抱团抗争,才能保命。

杨氏一门不愧是千户头目的后代,磨寨所建十万屯,仅从名字的气势上就是大格局,就够吓唬人的。十万屯的实际规模,在思州府也是首屈一指的。通过杨氏寨老的指引介绍,我得以对十万屯及其周边布局进行了实地考察,获得了粗略的印象。

十万屯自与别的石屯有着很大的不同。别的山顶石屯,构筑单一,不过就是一座简单石屯,开几个进出的门,四周修建围墙,里面仅能容纳几十上百号人,没有其他附属设施,群众建来仅是躲避匪患,用的武器就是一些火铳、大刀、长矛,更多的是捡来的山石。而十万屯,却是一处防御周全的军事基地。

杨洪武老人说,十万屯是军事指挥中心,上面驻得有部队和群众,有枪有炮。周围还有其他军事设施,分别派有兵丁把守。有个地方叫马坐职,专门用来骑马射箭习武的,以前磨寨代代都有射箭好、武术高的能人;有个地方叫孔目山,相当于瞭望哨,专门用来观察敌情。马坐职中间有一座山,叫中间坡,是发号令的地方。中间坡有一湾头建有兵工厂,专门用来炼钢铁打造兵器,目前还遗存一座好几百米高的炼铁炉,地上还有厚厚的一层铁渣。磨寨对门的一座山叫炮楼坡,安排有几门大炮在坡顶上,如有土匪进寨,就打炮消灭。

《墨谱流芳》记述,咸同年间,苗军多次攻破过思州府城,却未能一次攻破过近在咫尺的磨寨十万屯,原因何在呢?我想,除了十万屯建在险要的山顶易守难攻之外,还应得益于周边先进而严密的军事防御系统、杨氏熟练的军事指挥能力和训练有素的家兵队伍的保卫能力。

十万屯是建在杨氏家门口的军事基地,也是摆在他们家门口的“战场”。十万屯的建设和实用,激发了磨寨杨氏的尚武精神,族中子弟,人人争先,为保家卫国练武强身、射马射箭。在动乱年代,与来犯之敌的防守与进攻的较量中,逐渐形成一支指挥和训练有素的家兵力量。杨氏势力最终发展到不仅能够保卫磨寨一族的安全,而且杨氏中的能人,还逐渐组织和掌管起一支强大的地方民团力量,担当

起思州地区的治安防务。

道光年间,磨寨杨氏子孙中,出了一个叫杨星炳的增生,习得一身好武艺,受聘主办思州府团练,因保境安民有功,陆续升任县丞、知州、府经历等职。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,其子杨宗耀出世,杨星炳在老家学馆悉心教化,聘请严师教文习武。宗耀自幼聪明,喜读书,尤好骑马射猎,弄刀舞剑。青年时期,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,最拿手的是一条软鞭,使得出神入化,无人能近其身。身逢乱世,宗耀在家组织青壮年习武保卫家境安宁,令远近来犯之敌闻风丧胆。

“宗耀自同治二年(1863年),从戎江南、南阳、新野、邓州等处,数载凯旋。”后奉命协助湖南布政使兆琛、湘军名将席宝田在思州、镇远、三穗、沿河、雷公山等地平乱,因功被朝廷记名简放,赏加提督衔擢升云南边防副督办,兼带两营部队驻防麻栗坡,代表中国政府处理边防外交事务。

杨宗耀主持云南麻栗坡边防事务7年多时间,经常跟法国(当时越南被法国侵占,边防吃紧)边防人员打交道。在外国人面前,宗耀不卑不亢,处理边防事务以祖国利益为重,决不委曲求全,谨守爱国爱民宗旨,对法越方面有损中国人民利益的行为英勇斗争,寸步不让,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。宗耀爱国爱民,为官清廉,告老还乡时,清廷诏封他为建威将军,当地群众结队欢送,家乡百姓夹道欢迎。

杨宗耀的儿子杨建藩文才出众,成年后投身军营,随父戍边,在父亲麾下掌文书,主文案,主管机要。由于父亲年事已高,不耐远行,经常派遣建藩为全权代表,赴越交涉谈判,办理公务。杨建藩在越南结识了革命党人,秘密加入了同盟会,准备回云南策应起义。后因事情败露,起义未获成功。清廷准备对杨宗耀发难,宗耀辞告老还乡,建藩也随父解甲归田。

磨寨杨氏,不管是在治世还是在乱世,崇文尚武的初心始终未有丝毫改变,越是在乱世,越是重视对子孙的教育。

同治十一年(1872年),磨寨官绅杨星杰记述:“古言读书不负人,爱族中小子有造者数十人,延请严师训导,或可厚望于将来耳。”光绪年间,磨寨自称“吉士”的杨氏读书人记述:“少置良田地,多教贤子孙。当日族中,五馆肄业,府考名拔前茅。”“视吾族之文经武纬,代不乏人。”

长期以来,杨氏不仅在磨寨重视教育和治安,还积极倡导思州府的教育和民团力量。同治六年(1867年),磨寨官绅杨星杰在思州府主持办理考试局,发展振兴思州教育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八月,杨建藩随父回乡后,时局依然动荡不安,他积极倡练民团,维护社会治安,并以民团为基地,发展革命力量,宣传民主共和。民国十三年(1924年),杨建藩成为思县(岑巩县)代理县长,大力整饬团务,加强社会治安,仅半年,社会大治,人民得以安居乐业。杨建藩卸任后,回到老家磨寨,随后又出任县保卫团总监、团总职务。

杨建藩在岑巩历史上是个文武兼备的官绅,他一生好学不倦,酷爱诗文,著有《苑园诗稿》两卷,诗中反映他一生从戎为官的经历,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重大事变,诗文大气磅礴,格调雄迈低沉,反映了他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。

杨建藩不仅在社会治理上有方,而且在家庭教育上也大获成功,他养育了四个儿子,其中有三个大有出息:长子杨洪鑫,做了福建省宁化县县长,国民党十五军军需主任;次子杨洪森,做了贵州省岑巩县参议长、盐务局长、税务局长和征收局长等职;三子杨洪尧(尧),当过国民党陆军少将,当过浙江省吉安县长,后来又做了贵州省玉屏县县长。杨洪尧(尧)15岁高小毕业,升入省城贵阳师范学校学习,17岁考入黔军第一师模范营当兵,后随军长王天培出师北伐,参加攻克南昌战役,做过黄埔军校四期学员。土地革命时,参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。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淞沪会战、南浔线会战、南昌会战、长沙会战、湘鄂赣边区扫荡战、上高会战、浙赣会战等大小战役数十次。抗日战争中,他战功赫赫,曾先后获得“光华甲种一等奖章”“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”和“千城甲种一等奖章”。杨洪尧从国民革命军连长一路升任到团长、国防部总参部高级参谋、总统特派战区视察第一组代组长、陆军少将、国民党中央特派东北战区视察官等职,当过国民大会代表。

从杨宗耀,到其子杨建藩,再到其孙杨洪尧几兄弟,磨寨杨氏一门出现了“爷孙两将军,父子三县长”显荣,一时誉满黔中。

民国元年(1912年),唐继尧率滇军入黔,在任贵州都督期间,亲笔题写“将军第”匾额,悬挂在磨寨杨宗耀宅的大门之上。

遗憾的是,解放前夕,以杨洪尧为首的磨寨杨氏国民党官绅10余人,死心塌地为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效劳,顽固不化维护自己的地主阶级利益,走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,最终以悲剧收场。



杨氏一门在磨寨繁衍生息,平稳地度